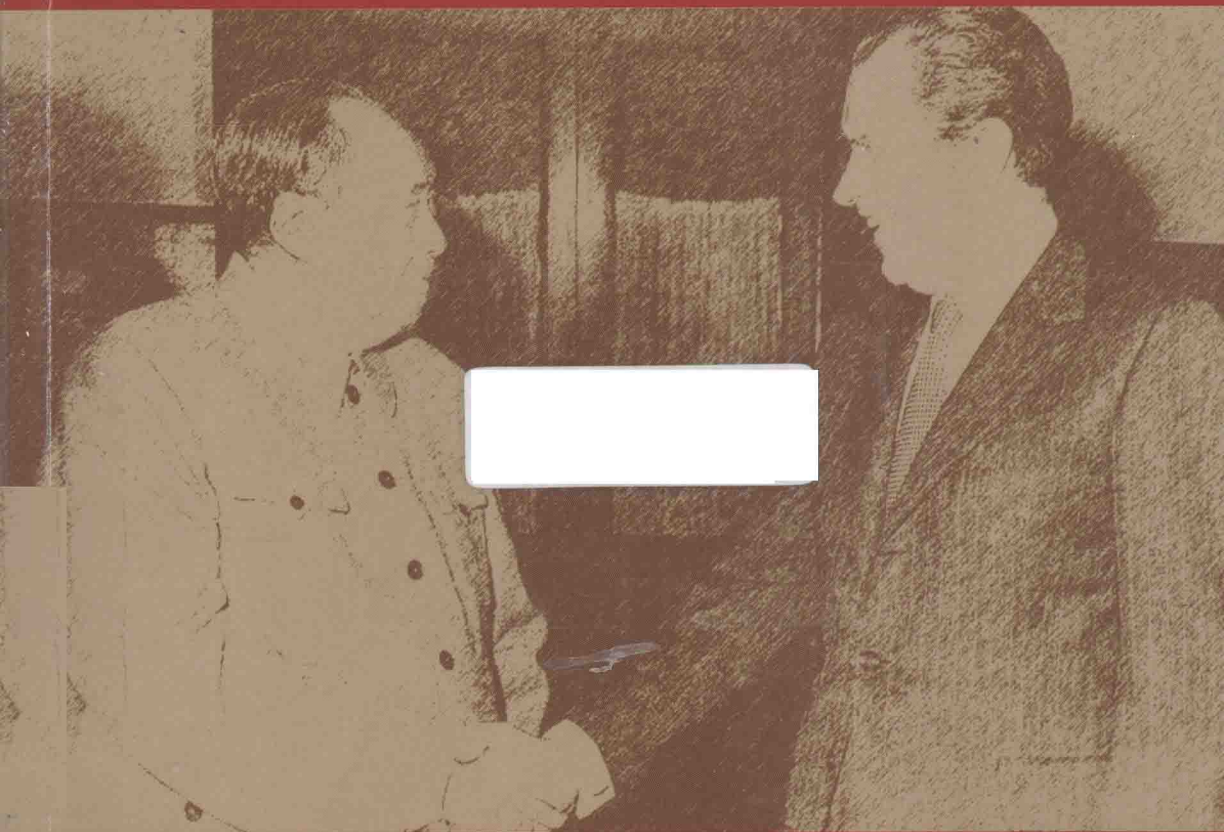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史丛书

薛庆超 著

中国外交重大突破 · 毛泽东 “南方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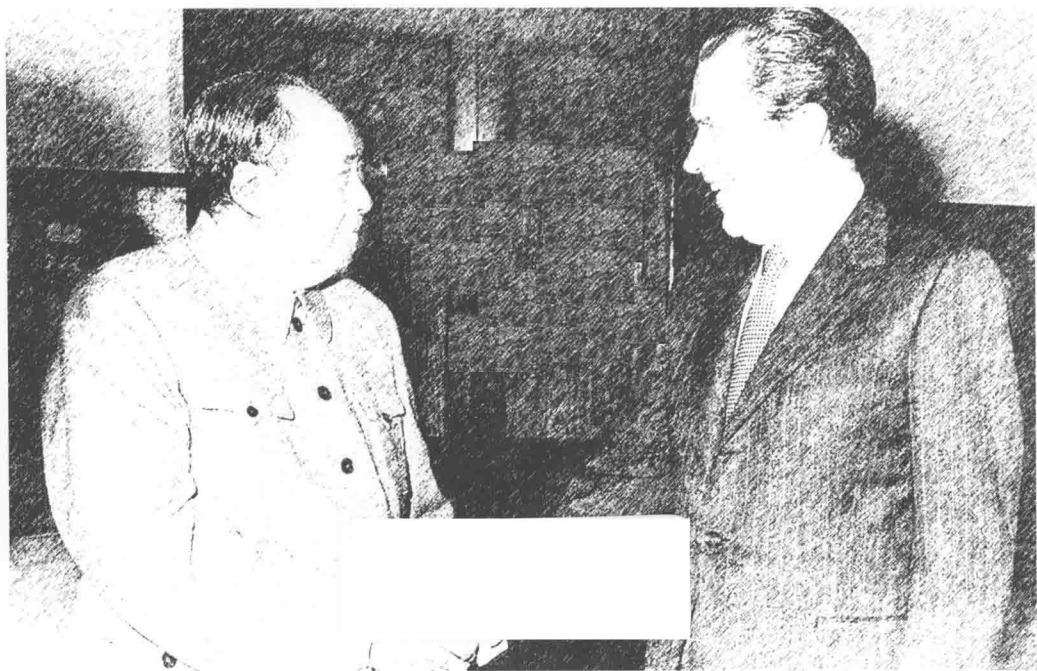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丛书

薛庆超 著

中国外交重大突破· 毛泽东“南方决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薛庆超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1(2014.4月重印)
(中国现代史丛书)

ISBN 978-7-220-08499-7

I. ①中… II. ①薛… III. ①外交史—史料—中国—现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0978 号

ZHONGGUO XIANDAI SHICONGSHU

中国现代史丛书

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

薛庆超 编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刘周远·李洪烈
李洪烈
邹小工 王泉语
戴雨虹
徐 英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65×235mm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19.25
350千字
2012年1月第2版
2014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20-08499-7
2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总 序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问题

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曾经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立德、立功、立言作了注疏。他指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中华民族，创业维艰，筚路蓝缕，雄踞东方。古往今来，世事交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而唯一不变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传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中国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辉煌，浓缩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古代史，先人创业，开拓封疆，创造了疆域辽阔、生生不息的东方大国。中国近代史，由盛而衰，血泪交织，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中国现代史，地覆天翻，人间巨变，记载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壮丽史诗。

关于中国现代史，有多种不同的分期：

一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以此为标志结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由此从近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史。

二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是，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虽然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目标仍然没有改变。而



且，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一直没有改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现代史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

三是把中国近现代史联系在一起，以1840年中国人民反抗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而爆发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样，把整个中国社会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方法。

四是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从中国现代史中划分出来，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序列），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

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与分期，不论哪种划分方法，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均可成立，接受史学界和社会的检验。凡是史学界和社会认可的划分方法，就可以作为大家公认的划分方法；凡是史学界和社会不太公认的划分方法，则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中国现代史论》采用了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划分方法。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若干问题

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认识永远是一个过程，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探索总是层出不穷。

人类对于历史科学的认识没有终极真理。因为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并由此推动着历史科学不断发展，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中国现代史论》就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作者对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问题深入探索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过程与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到夺取全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发展与巩固……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爆发与十年内乱……

林彪为何成为“接班人”？林彪集团的形成、崛起与覆灭……

江青集团的形成、崛起、衰落与覆灭……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历史真相、“王洪文现象”的历史原因、王洪文被扫进历史

垃圾堆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中共中央决策粉碎“四人帮”的详细过程与具体实施细节……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历史内情……

当代中国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缘起、发展与评价……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的重大史实……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历史辉煌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三、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视角与特点

实事求是，古已有之。贵在坚持。贵在发展。贵在创新。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首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进而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重要思想指南。

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理论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精神。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中国现代史论》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其主要特点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一，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发现并正确的解说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奠定阐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坚实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要用辩证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准确的史实，严谨的方法，多角度的视角，多侧面的视野，与时俱进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恢复历史本原，找出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还原历史、发现规律，资政育人、开拓创新、开创未来的目的。

第二，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历史、反映历史、复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必须摒弃对于历史的所有伪造、篡改、曲解、戏说和捏造。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迅速从华南上升到中央，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很快晋升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然后，又很快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对此，人们一直如坠云雾，弄不明白。《中国现代史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陶铸上升与被打倒的真相。为了说明问题，专门以一定篇幅引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上的争议问题。对此，要坚持以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重大史实目击者的回忆为基本依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中国现代史论》翔实地反映了天安门事件中，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深情悼念周恩来、坚决拥护邓小平、愤怒反对“四人帮”的真实历史场景。同时，也详细引用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德的回忆，从吴德的角度说明了天安门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与被江青集团镇压的情况。两相对照，天安门事件的伟大历史意义便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四，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人物。东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过，对于历史人物研究，要做到：好人“不溢其美”，坏人“不增其恶”。历史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主观原因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写历史的时候，都要真实对待，真实反映。《中国现代史论》在评价华国锋时，就对具有多方面的不同形象的华国锋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在全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一位从革命青年一级一级逐步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老实本分，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十年内乱时期，华国锋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主持了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既要充分肯定其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粉碎江青集团的重大贡献，又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坚持过“两个凡是”的错误，不能因为肯定其某一方面而肯定其一切方面，也不因为否定其某一方面而否定其全部方面。

第五，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事件。掩盖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空的种种迷雾，造就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虚构，甚至伪

造。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进行详尽的考证，力求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弄清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中国现代史论》对于粉碎江青集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动因、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精心部署、粉碎江青集团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展示出一幅真实的历史场景，把历史的真实还原给历史、还原给人民、还原给读者。使人读后，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重要作用，重要人物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六，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疑难问题。《中国现代史论》对至今在中国和世界上还存有争议的一些重大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答疑。以消除疑问，揭示真相，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现代史论》对于林彪事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澄清，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因为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而点燃的大火早已熄灭。但是，各种说法却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往往“假说”比真实更生动、更具体、更能吸引人、更有传播空间。于是，关于林彪死亡的“中国导弹击落说”、“苏联驻蒙古军队导弹击落说”、“玉泉山说”、“林立果绑架林彪说”等等，一直在中国、外国流传着。《中国现代史论》以权威的历史当事人回忆、苏联历史当事人回忆，缜密考证，翔实研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政府关于林彪事件公布的史实都是正确的、确凿无疑的。一些“流行的最新说法”大都属于“推测”、“设想”、“主观臆断”，并没有任何历史证据作为根据，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对待历史；就要用辩证的逻辑、发展的思维，思考历史问题、看待历史问题；就要用历史的智慧和时代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真相；而绝不能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

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论》仅仅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块“铺路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中国现代史论》的唯一标准……

作 者

2010 年春天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001
第二章 “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地球”	013
第三章 中美高层的“秘密对话”	025
第四章 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	033
第五章 基辛格回顾与周恩来会谈	041
第六章 震动世界的中美《公告》	050
第七章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058
第八章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068
第九章 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	076
第十章 毛泽东纵论国际形势变化	084
第十一章 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	095
第十二章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106
第十三章 一个新闻记者充当了外交官	111
第十四章 中国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	116
第十五章 邓小平从江西致信毛泽东	124
第十六章 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	129
第十七章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136
第十八章 引进成套设备 修建坦赞铁路	143
第十九章 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53
第二十章 中共十大·“四人帮”的形成	163
第二十一章 王洪文成为新的接班人	170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脱颖而出	181
第二十三章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86
第二十四章 总政治部主任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192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拔地而起	201
第二十六章	江青集团连续制造事端	208
第二十七章	《中国》事件·“风庆轮事件”·小靳庄·吕 后玉玺	217
第二十八章	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磨难	224
第二十九章	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阐述外交政策	230
第三十章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241
第三十一章	毛泽东到长沙养病	248
第三十二章	毛泽东“听书”、“听文件”	254
第三十三章	“我看是一出好戏”	263
第三十四章	毛泽东授权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	272
第三十五章	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四届人大与人事安排	280
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	288
后 记		293

第一章

毛泽东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与苏联结盟、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同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还与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经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外，新中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1964年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首先与法国建交，以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门。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江青集团支持一些人在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江青集团肆意抹杀新中国建国17年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诬蔑17年来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线。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被打乱。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斗。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反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这些都引起驻在国政府和官员的疑虑和不安。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中，对内“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外“四面出击”、“四处树敌”。仅在“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江青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北京数万人围攻、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办公楼的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面临着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和西北边



境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困境，打破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迅速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在整个世界上处于战略攻势，咄咄逼人；美国因长期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脱身，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处于颓势。在美苏争霸中，呈现着苏攻美守的态势。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一再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接着，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与中国对话。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反应。1969年10月，美国又通知中国说，它将停止派军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初，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中国方面经过研究，同意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当美方在会谈中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时，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以接待。”翌年10月初，尼克松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了愿意到中国访问的迫切愿望。他还先后向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一个外交场合，尼克松还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发出了举世瞩目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以后，巴基斯坦领导人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均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欢迎。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决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说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也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它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11月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



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急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鉴于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一再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还公开表示了愿意到中国访问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抓住时机，一举扭转乾坤。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打破中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孤立状态，毛泽东开始恢复和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4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或代表，同他们亲切谈话，亲自调整对外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号。从此，中国外交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停滞状态，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崭新姿态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震撼了整个世界，成为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最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认为：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反映出毛泽东在处理问题上独特的个性。

毛泽东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此他可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观察、等待，寻找时机。

毛泽东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影响乃至改变大局的细枝末节。

因此，当美国表现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后，毛泽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果断行动。

毛泽东洞悉中美关系的微妙进程，抓住时机，于1970年10月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发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明确信号。

吴旭君回忆说：

毛泽东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

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日，他把美国记者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后，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泽东能这么干，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日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毛泽东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座的右侧，我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卫士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常委都已经站在那儿等候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我们走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毛泽东临近天安门城楼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走向正中央，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毛泽东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城楼的正中央。

从城楼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检阅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毛泽东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毛泽东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死地。美国先后进行了侵朝战争，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在



台湾海峡进行挑衅，以及发动侵越战争。在外交上，美国又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针锋相对，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在中苏友好的历史背景下，是苏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历史发展到6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变化。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这一切都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走向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态势的新局面产生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世界是否正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呢？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是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呢？

毛泽东从饱经忧患、历尽沧桑、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中清楚地记得，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竟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牺牲了大约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取得1949年的胜利——新中国诞生。

与此同时，毛泽东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可是事与愿违。对于这期间的局势，毛泽东曾幽默地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50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60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

毛泽东曾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显然，毛泽东懂得，这样横着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采取主动，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岂不更好？毛泽东虽然从没有这样明确地对我说过，但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他要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1970年10月2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报纸《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上，一律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毛泽东以东方哲人的独特智慧，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发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改善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确凿无疑的信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竟然都没有发现毛泽东这一具有东方智慧和深奥内涵的特殊

举动的深刻含义。因为在美国统治阶层眼中，斯诺是一个“亲共分子”，毛泽东会见斯诺并不奇怪。

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后来在《基辛格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斯诺后来谈到：“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泽东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毛泽东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国际战略家。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两个多月后，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毛泽东在这一次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过程中，谈了许多问题。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文化大革命”前教育界的状况：“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师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关于“文化大革命”前党内状况：“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状况：“……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关于个人崇拜：“总是要有人崇拜嘛！”“这是为反对刘少奇。”“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就是教员。”

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美关系与尼克松访华问题。毛泽东说：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